

課程：西洋戰略思想史
指導教授：施正權 博士
學生：研一 苗繼德
日期：87年 6月 8日
報告專題：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壹：前言

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是研究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的著名學者，他所研究的範圍一直在非西方文化領域中的國家。他的著作在臺灣共有三本翻譯成中文，依時間先後分別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及今天要討論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簡稱「文明衝突」）。

就這三本著作來分析杭廷頓的思想脈落，我們不難發現杭廷頓的思想轉變和美國政策與思潮的變遷有密切的關係。第一本著作杭廷頓的焦點放在如何讓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而其主要的立論依據在於政治秩序的穩定，主要是反對戰後盛行於美國學術界與政壇的現代化理論。因此他在書中極力主張穩定這些國家的政治秩序比鼓勵民主改革更加重要，因為穩定的政治秩序是經濟成長的前題，所以，他引用了若干統計資料而提出其見解，一黨專政的國家比多黨制更加穩定，而且有利於經濟成長，因此而豁免了獨裁的責任¹，且對美國政府當時支持若干獨裁的非共政權，提供了學理上的證明。

第二本著作完成在冷戰剛剛結束後，因此大規模的民主浪潮形成的骨牌效應是美國所樂於見到的，而且深信有助於和平及擴大西方

¹ 見《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譯本中的吳乃德所著的導讀。聶振雄等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台北：時報出版社，1994，初版），頁XI。

的勢力²。杭廷頓這時的焦點在於如何防止「第三波民主的回溯（reberse wave）」³，意即如何防止舊勢力對新民主政權的反撲，並且提供若干方法給予這些國家的領導者，這本書的出現更提供了美國政府向外干涉的理論與依據⁴。

而「文明衝突」成書在於後冷戰時期業已漸趨穩定，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發現後冷戰時期舊共產勢力雖然土崩瓦解，但民族主義卻在此時勃興並填補其所遺留的權力真空，不僅未帶給世界更多的和平，反而造成更多的傷害，更甚者這些國家不遵守西方文明的所訂定的遊戲規則，各自以區域強權的模式，稱霸一方。杭廷頓試圖以文化的角度，尤其是宗教，為西方文明找出潛在的敵人和預防的方法⁵。

由此看來「文明衝突」一書的出現，是為美國刻劃未來全球戰略的藍圖，而非消弭世界衝突，是為美國維護霸權地位而不是解決國際紛爭。

貳：本書架構

依照杭廷頓的解釋，這本書共分五個部份。中心主旨是探討文化和文化定位在後冷戰世界，正在塑造分合和衝突的不同型態⁶。

第一部份是討論多元文化的並存型態，並且說明現代化不等於西化，現代化更有別於西化；第二部份是描述文明均勢的轉變，西方沒落和非西方的興起；第三部份是分析世界秩序如何由文明主導；第四部份是分析文明間的衝突源頭和原因；第五部份結論是強調西

² 見 Henry Kissinger 著，林添貴與顧淑馨譯，大外交：上（臺北：智庫文化，1998，初版），頁45~46。

³ 見 Samuel P. Huntington 著，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4，初版），頁318-321。

⁴ 見 Samuel P. Huntington 著，田弘茂等編，鞏固第三波民主（臺北：業強出版社，1997年10月，初版），頁48~64及 Michael Pinto-Duschinsky 著，田弘茂等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臺北：業強出版社，1997年10月，初版），頁515~570。

⁵ 許介麟著，「評美國杭廷頓之文明衝突論」，自由時報，版六，1993. 7. 30。

⁶ Samuel P. 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初版），頁4。

方存續有賴美國重新肯定其價值，要保持西方的霸權地位，就是要肯定西方文化並不是世界文化，並且團結西方對抗非西方的挑戰。而下一部份即是本書的摘要。

參：各章節重點摘要

第一章 世界政治新紀元

杭廷頓在本書一開始試圖以「文明典範 (civil paradigm)」，或文明劃分及文明相互衝突來解釋世界政治藍圖，首先，杭廷頓採取了國際政治學上多極體系 (multi-polar system) 的觀點⁷，來建立其多元化的世界觀。雖然杭廷頓仍承認民族國家在世界政局的重要性，但他更強調後冷戰時代中，文化趨勢共通性及差異的影響力的重要。他引述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的話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二十世紀的國際制度，將至少包括六大強權，即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也許加上印度，至於中小型國家則是多元發展。」⁸。

藉著這個假設，杭廷頓所下的結論即是：「全球政治即是文明政治。超強間的對立，如今已被文明的衝突所取代。」而他將世界衝突的肇因，歸之於文明間的「斷層線」兩側間的敵對關係⁹。

其次，杭廷頓在第一章試圖介紹其處理其世界觀的分析途徑(即國際政治的分析架構)，他借用湯瑪思孔恩(Thomas Kuhn)的「典範移轉 (paradigm shift)」的概念¹⁰，來解釋其「世界觀移轉」的觀念，並試圖說服讀者接受其「文明世界觀」：在國際分析架構中，優於「一個世界觀」、「兩極體系」、「國家中心主義 (state

⁷ K. J. Holsti 著，李偉成與譚朔澄譯，國際政治分析架構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8年5月初版)，頁121-124。

⁸ 同註5，頁6-7。

⁹ 同註5，頁7。

¹⁰ Thomas Khun著，程樹德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4年初版)，頁165-190。

center) 」¹¹、「混亂典範 (chaos paradigm) 」¹²，且更能解釋世界真實面，符合典範中的「現實主義」及「簡約理論 (reductionist theory) 」的要求。

最後，杭廷頓用其「文明典範」分析解釋冷戰結束後的世界衝突，並據此強調世界各地文明的互動，為當今及未來國際政治的主流。

第二章 歷史和今天的文明

杭廷頓在提出「文明典範」的觀念後，他嘗試由六個面向去定義「文明」的意義，及界定出「文明典範」的適用範圍。這六個角度包括了¹³：

- 1.單數文明和複數文明的區隔;杭廷頓並非採用文明與野蠻的相對觀，即非文明及野蠻的單一文明觀，而是採用「世界上存有許多文明每個文明各有特色」的複數文明觀¹⁴。
- 2.文明與文化的差異:杭廷頓所謂的文明，是文化的擴大。在此杭廷頓嘗試將文化間的差異和宗教作一聯繫，因此他指出:「而不同族群間最大的區分，在他們的價值觀、信仰、制度、社會結構，而不在他們個子的大小、頭顱的形狀和膚色。」。
- 3.文明是最廣義的文化實體:杭廷頓採取湯恩比(Arnold Toynbee)、梅爾科(Melko)對文明「整體性」的說法，因此「文明典範」中的文明，主要界定為主文明，而非文明中地方差距或次文明¹⁵。
- 4.承認文明會演進：採取美國人類學者奎格利(Corroll Quigloy)文明演進區七個階段:融合、醞釀、擴張、衝突的年代、世界性帝國、式微和入侵，及梅爾科的

¹¹ 即指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國際關係模式。來源同注7。

¹² 指國際間沒有一定的秩序，而陷入原始社會的混亂中。來源同注7。

¹³ 以下的論述擷取自來源同註5，頁34-43。

¹⁴ 指多元文明共存，而各自發展，自成一格。

¹⁵ 指主文明之下的分支或少數民族，前者如基督教的分為新、舊教；後者如中國的西藏或蒙古。

文明演進過程。杭廷頓為其文明衝突論中的西方文化沒落及儒、回文明興起的立論下了最好的註腳。

5.文明是文化而非政治實體:杭廷頓將文明界定為文化圈，他強調:「在現代世界大部份文明包括兩個以上國家。」以此作為他定位主要文明的依據，尤其是以文化和宗教所界定的文化圈，如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和回教文明...等。

6.文明的數目:杭廷頓藉由確定文明的數目，來界定其理論所解釋的範圍。它將世界主要文明界定為：中國、日本、印度、回教、西方文明、俄羅斯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及杭廷頓認為即將凝聚成以撒哈拉大陸的非洲文明。其中俄羅斯東正教文明，杭廷頓並未深論；而拉丁美洲文明，杭廷頓認為在國際政治關係上，應歸屬於西方的次文明。

除了界定「文明」的意義，杭廷頓也介紹以文明間的關係互動及其對西方的影響，來闡述文明間的衝突，藉此來描繪他所假設的「文明間的斷層線」，並強調非西方文明的興起。

第三章 世界文明?現代化與西化

在此一章中，杭廷頓嘗試以語言、宗教的差異與鴻溝粉碎世界文明的迷思（myth），並和他所假設的多元化文明作連結。雖然杭廷頓肯定英語在世界語一定的地位和功用，但他更強調「歷史上世界語言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權力的分布。」¹⁶，因此他不僅肯定「隨著權力擴散，語言也錯綜複雜。」¹⁷，更重要的是，他將提倡本土語言及打壓帝國語言作一連繫，來刻劃出文明衝突的陰影。

而宗教方面，雖然杭廷頓肯定「世界宗教比世界語言出現的機率高一點」¹⁸，但他不將基督教作為典範，更用人口成長率來警告基督徒，回教將凌駕基督教之上。用此說明未來宗教衝突之不可避免。

¹⁶ 同註5，頁69。

¹⁷ 同註5，頁71。

¹⁸ 同註5，頁73。

接著杭廷頓反駁一種世界文明正在形成，並用「特色理論（specific theory）」來詮釋此一現象。試圖勾勒多元文明的圖像，並說明貿易與傳播皆無法弭平文明間的斷層，故而無法統合成單一文明。

此外，本章節另一個部份是辨別西化和現代化的不同，並描述非西方社會對西化及現代化的三種反應：拒斥、全盤西化的凱末爾主義、和排拒西化但接受現代化的改革運動（reform movement），最後作成「現代化加強那些文化(非西方)，並降低西方的強勢」¹⁹的結論。用「世界越來越現代化，但比較少西化」²⁰來警告西方，勿對新興現代化國家抱持太大的期望。

第四章 西方的消退：權力、文化和本土化

首先，杭廷頓敘述了今日的西方世界：「西方，不但今天壓倒性的主導世界，在邁入二十一世紀時，其力量和影響力仍將高居世界之冠……相對於其他文明，西方勢力將繼續式微……大部份權力將消失無蹤，向其它文明及其核心國家同的區域擴散。」²¹也就是西方勢力，日趨邁向沒落。杭廷頓指出此一過程有三個特點：一、過程緩慢；二、沒落並非直線進行；三、勢力消長是相對的。杭廷頓以領土和人口、經濟產值、軍力等，來描述西方與非西方國家間權力的消長，此論點在於使西方世界注意到非西方文化的復甦。

其次，杭廷頓將焦點放在非西方文化的復甦，是根基於反西方的本土化過程。當然伴隨而來的宗教復興也非西方的。為此，他下了一個結論：「我們會現代化，但我們不是你²²」。

第五章 經濟學、人口統計學與文明挑戰者

¹⁹ 同註5，頁89。

²⁰ 同註5，頁89。

²¹ 同註5，頁101。

²² 同註5，頁126。

前一章杭廷頓將本土化與宗教復興解釋為：新興文明對西化拒斥的兩大因素。而這一章他試圖將焦點放在他認為最有威脅的亞洲和回教世界這兩個區域，尤其以經濟成長和人口增加來描述這兩個區域日益高漲的自信(排斥西方)，和日漸加大對西方的威脅。

杭廷頓首先以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和亞洲四小龍與四小虎每年以8%到10%的平均成長率，擴張了十年之久；甚至世界銀行（world bank）於1993年宣稱這一「中華經濟圈」已和美、日、德並稱四大成長區域，他並預估中國經濟在二十一世紀將高居世界之冠。事實上，亞洲在1990年代，已經有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指日本與中共），到公元2020年，可能在世界五大經濟體中居其四（指日本、中共、印尼、南韓），而在十大經濟體中佔七個（除以上四個之外加上臺灣、泰國與馬來西亞），屆時亞洲社會可能會佔全球經濟產值的40%以上²³（但當時東南亞經濟風暴尚未發生，因此，這些數據僅僅只能提供參考）。

杭廷頓認為東亞經濟發展，改變了亞洲和西方之間，尤其是和美國之間的權力均勢。他認為亞洲經由經濟力的成長進而自我肯定，而這種強調自我文化特色的發展模式，被杭廷頓稱為一種「文化復興」的運動，而他引用1993年新加坡駐美大使許通美的話：「文化復興傳遍亞洲，因為亞洲人越來越有自信。這意味著他們不再視西方或美國的東西必然是最好的。²⁴」杭廷頓將此文化復興的意義，定位在東亞試圖找出亞洲和西方文化價值的不同點。

而杭廷頓更分析了這種「亞洲肯定說」，而提出四大構成要素²⁵：

一、經濟成長刺激了亞洲社會產生了一種權力感，這意味著西方正快速喪失使亞洲社會在人權和其他價值觀上，接受西方標準的能力。

二、亞洲人深信他們的成功和西方的失敗，歸因於自己文化的優越性，及西方文化的頹敗。因此，美國和西方必須質疑自己有關社會和政治佈局的根本假設，並在此一過程中向東亞各國學習。

²³ 同註5，頁132-140。

²⁴ 同註5，頁134。

²⁵ 以下這些擷取自來源同註5，頁137-140。

三、亞洲人認為亞洲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作為文化價值體系中的中心骨幹。因此，會對西方捍衛這些價值觀，及提倡彼此的共同利益。而東亞各國最直接的經濟利益，就是打開西方市場；

四、杭廷頓認為東亞各國會主張「亞洲發展和亞洲價值，是其它非西方社會的樣版。」，也就是亞洲將會輸出這套價值，而提倡「太平洋全球性干涉政策」，把「亞洲全球化」，因而「決定性的打造新世界秩序的特性」。

最後，杭廷頓下了結論：「物質上的成功，孕育了文化上的主張，強硬的政權產生了軟性（soft power）的權力²⁶。」。

至於回教復興，他以大家廣為所知的宗教輸出和人口成長，來分析回教文明對西方文明的壓力。他舉1965 到1990年間的例子：地球上總人口從33億躍增為53億，年成長率高達1.85%。而回教社會則永遠超過2%。以北非而言，馬格里布人口，每年平均以2.65%成長，25年間，人口數由 2940 萬人劇增為 5240 萬人；中亞，人口成長在1970 到 1993 年間分別是：塔吉克 2.9%；烏茲別克2.6%；土庫曼 2.5%；吉爾吉斯1.9%；但人口佔俄羅斯一半，但非回教社會的哈薩克僅有 1.1%。而杭廷頓相信回教社會由1980年佔世界人口的18%，到公元2000年20%，2025年可能會佔全世界人口的30%。而人口越多，需要越多資源。人口成長快速的社會，會向外推進，佔領土地。例如俄羅斯因回教徒成長24%，而俄羅斯人口只成長6.5% 而感到憂慮。以色列也對巴勒斯坦人口感到忐忑不安²⁷。

無論經濟成長或人口增加，杭廷頓都為西方社會在未來受到的壓力，而倍感憂心。他下了一個結論，預測二十一世紀末初幾年：「非西方勢力和文化可能繼續出頭，而非西方文明內部之間，以及其和西方民族之間也將繼續衝突下去²⁸。」。

第六章 全球政治依文化重組

²⁶ 同註5，頁140。

²⁷ 同註5，頁140-154。

²⁸ 同著5，頁156。

杭廷頓依其觀察，而預測未來的國際政治必改變為文化認同政治，由意識型態和超強國際所界定的組合，被文化和文明所界定的關係取代；政治版圖重劃越來越和種族、宗教及文明的文化版圖重劃不謀而合，文化社會正逐漸取代冷戰集團，而不同文明間的斷層線，也變成全球政治衝突的中心線²⁹。

為什麼文化同質性，助長不同人民間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差異則加深了裂痕和衝突？杭廷頓對這兩個問題自問自答的，提了五點說明³⁰：

第一，在多重定位下，最直接面對面層次的認同，通常最有意義。就如同軍隊中，士兵對班、排的認同，遠超過對軍、團的認同。因此，文化的認同遠超過意識型態及國際政治利益。

第二，文化認同越來越凸顯，主要是非西方社會的能力和權勢的擴張，刺激了本土認同和文化復興。

第三，同族類間對待方式，和非我族類的方式本就迥異，主要來自四項因素：

(一)對被視為極為不同人的優越感(或自卑感)；

(二)對異族的恐懼和不信任；

(三)語言及文明行為定義的差異，導致溝通困難；

(四)不熟悉其它人的想法、動機、社會關係和社會習俗。

第四，文化的衝突是無法理性解決，因為文化是有深厚的歷史和感情淵源，因此兩方的衝突是一種「是」或「不是」的零合（zero）選擇。

第五，衝突無所不在，仇恨是人之常情，為了自我定位和動機，人類需要敵人。

²⁹ 同註5，頁165。

³⁰ 以下這些看法改編自同註5，頁169~172。

除了上述的解釋外，杭廷頓更以「區域經濟或軍事聯盟」來證明文明為合作的基礎，他指出地理不是結盟的主要因素，如巴爾幹和中東文化的不同，衝突遠大於合作。少了文化，地緣鄰近性不會產生通性，反而可能適得其反，軍事結盟和經濟組織需要其成員的合作，合作要靠互信、而共同的價值觀和文化最容易滋生互信。他更舉北約的成功，絕大部份是因為會員有共同價值觀和哲理，及歐洲共同文化³¹。

當然多元文化組織也不是沒有出現，但杭廷頓舉東協為例，來解釋其間的困難。他認為東協不僅不是多元文化組織有效的案例，反而是暴露這類組織有極限。以被認為最有經濟成就的經濟議題而言，東協一開始就是為了達成經濟合作，而不是經濟整合結果，區域發展『牛步化』，甚至自由貿易也推遲到二十一世紀才列入考慮（而這次東南亞經濟風暴，東協各國各自為政，尋找奧援，集體機制力幾乎沒有功效。足以證明杭廷頓的說法），他認為在即將出現的世界裏，貿易模式將深受文化影響，如同過去受國家結盟方式影響經濟合作，源於文化的同質性。

此外，杭廷頓接著論述所謂文明結構下各種的類型如核心國家、同心圓國家、分裂國家(cleft country 因文化不同而分裂)、分化國家(torn country即國家內單一的主文化，但其政治菁英希望轉到另一個文明，與分裂國家不同在於他們對身份雖有共識，但對那一個文明才是他們所希望轉向的文明則有歧見)，尤其是分化國家，杭廷頓試圖解釋在俄羅斯、土耳其、澳洲等分化國家的轉型中證明，由一種文明轉變至另一種文明是非常的困難與艱困的。

第七章 核心國家、同心圓和文明秩序

在這一章，杭廷頓指出世界秩序將由兩大超強國掌握過渡到各大文明核心國家的手中，他分別以西方世界、俄羅斯、中國與回教來闡述這個觀念。

³¹ 同註5，頁172~177。

他以「劃定西方邊界」為標題來討論西方文明的領域。他認為冷戰時期發展的西方組織，在冷戰後接納新會員時的標準，是歐洲認同和基督教世界。在這兩個標準下，波羅的海即是西方要保護的盟邦，而希臘則是越來越向東正教的俄羅斯靠攏。

而以東正教為基礎的俄羅斯，周遭則以比較弱勢的回教或正教國家為緩衝區，俄國希望對這些緩衝國施以不同程度的支配，並且排除其他強權勢力，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俄羅斯更希望世界能接受和贊同這種局勢，而此一局勢最大的挑戰是烏克蘭是否與俄羅斯再次的結合³²，烏克蘭內部分為兩大部份西部主要是操烏克蘭語的烏克蘭人而東部則是操俄羅斯語的俄羅斯人的分裂。而這分裂是影響到俄烏間關係的主要原因，也是影響到未來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走勢的重要原因，而這關係就如同法德關係是歐盟的核心，俄烏關係對正教世界的統一也居核心關鍵地位³³。

至於「大中國及其共榮國」的未來主要是在經濟成長所形成的一個龐大勢力，而杭廷頓認為「一個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經濟體即將逐漸形成」而這種形成的動力，主要來自龐大的海外華人。他舉1992年為例，中國大陸外資總額113億美元中有80%來自海外華人，其中香港占68.3%，臺灣占9.3%，而日本只占6.6% 美國更少只有4.6%，而在500億美元的累積外人投資總額中，67%來自華商。就如同李光耀在1993年所說的：「中國是一切行動的重鎮」。杭廷頓也認為包括臺灣；東南亞各國皆會因為相同文化而團結在中國的羽翼下³⁴。

最後杭廷頓提到他所認為有意識而無凝聚力的回教世界，而主因在於³⁵：

³² 某些西方觀察家（如Zbigniew Brzezinski）更以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結合視為俄國侵略主義再生的前兆，見葉自成著，俄羅斯政府與政治（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8月，初版），頁315~330，及Zbigniew Brzezinski著，林添貴譯，大棋盤（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4月，初版），頁55~56與頁100~101。

³³ 同註5，頁226。

³⁴ 同註5，頁226~233。

³⁵ 以下的說法來自同註5，頁233~239。

(一)回教被幾個互相競爭的權力核心瓜分，每一個都想利用和回教社會的認同，領導提倡回教團結，但誰都不服誰。

(二)回教社會缺乏一個強大的核心國家來凝聚團結，但杭廷頓恐懼得提到土耳其，如果重新定位，擺脫凱末爾主義，它有實力成為回教的核心國家。

第八章 西方及其他地方:跨文明議題

這一章杭廷頓提出導致文明間衝突的議題，西方普世論、武器擴散、人權和民主，和移民問題、他指出未來的衝突將是因為「西方的狂妄自大；回教的不容異己；及中國的專斷獨行。³⁶」

西方世界在冷戰結束後，更深信其民主自由理念已普遍風靡世界，但其他非西方國家，則視為西方是帝國主義的代言人。而西方嘗試努力維持其優越地位，維護其利益，並界定為「世界共同體」(world community)。但非西方人也毫不猶豫的立刻指出，西方一向有雙重標準；如西方提倡禁止核子擴散，故而伊拉克與伊朗不能擁有核武，但卻允許以色列非法持有；西方常常對中共的人權問題作文章，但對沙烏地阿拉伯則不是，如此等等的問題，造成了雙方不斷的衝突。

第九章 全球文明政治

上一章討論文明衝突的議題，這一章杭廷頓則嘗試以全球國際政治或戰略的角度來分析衝突的來源與區域、他描述了未來兩大衝突點:回教世界和西方；亞洲中國和美洲。

杭廷頓認為回教和西方再起衝突主要原因在於權力和文化的根本問題。而西方的敵人不是只有回教基本教義派，而是回教這個不同的文明，回教人民深信他們文化的優越性，並對其權勢處於劣勢而

³⁶ 同註5，頁247~277。

耿耿於懷，再加上西方的普世論，促使西方文化擴散。這些問題才是引燃回教和西方衝突的主因。

而亞洲和美洲的問題主要在於美國和中國在亞洲的權力和利益問題。無論是貿易衝突或區域平衡，美中都在亞洲有很大的矛盾，杭廷頓將衝突的爆發丟給中國內部的體制文化。他指出：「中國大陸的穩定多元體制可能會緩和和其他國家的關係³⁷。」。

最後杭廷頓規劃了未來文明的合縱連橫關係，儒回的聯盟形成且將與西方對抗，西方只能在其餘親西方的文明中尋找盟友（如東正教文明的俄羅斯、日本、印度、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但是除了日本與俄羅斯之外，其餘的這些文明的勢力太小），故而西方只能先從加強內部團結著手，再與其他的文明聯手，如此才能使西方（更正確的說是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維護其霸權地位。

第十章 轉型戰爭到斷層線戰爭

本章主要是杭廷頓分析了進入文明衝突的時代，戰爭型態的轉變在進入新紀元之前。杭廷頓引用摩洛哥知名學者艾曼吉拉的觀念，已有兩場看似國家衝突，但實質上卻是文明戰。它們分別是阿富汗及波斯灣戰爭，都是西方文明和回教文明的衝突，所不同在於爆發的原因，阿富汗戰爭是帶有冷戰時期的意識型態，而波灣戰爭在資源（主要是石油）的戰爭，但最後都使回教文明更加團結對抗西方社會。

進入多元文明時代，杭廷頓一直刻劃的斷層線戰爭終於浮出臺面，他認為這種戰爭不但持續很久（約六倍時間），且更加暴力（多有種族淨化傾向）。還有兩大特點，一是宗教因素的介入；二是戰爭的全面性。A 集團和 B 集團中的核心國 A、B 兩國的衝突，通常會鼓動集團內 A1 A2... 或 B1,B2... 加入戰爭。其次戰爭型態得多變，可能由恐怖活動到正式作戰等不同型態發生。最後杭廷頓仍以回教世界為例，說明此種戰爭的慘烈。不過他也預言，回教地區

³⁷ 同註5，頁297。

若經濟成長、失業人口減少，則可用於戰爭的人口變少，則暴力傾向及強度會下降。

第十一章 斷層線戰爭的動力

杭廷頓再次將注意力放在文明衝突的因素上，他認為文明的認同和排它是主因，而認同多是宗教性質的。

其次使斷層線戰爭持續及延長擴大的主因，即文明的號召。所謂「兄弟之邦症候群」，使得同文明國家和團體紛紛加入戰爭中，相對於冷戰衝突其並非由上而下，而是由下往上冒³⁸。

至於如何結束斷層線戰爭，杭廷頓分析說：要中止一場『完整型』的文明戰，需有以下條件³⁹：

- 一、 第二、第三層參與者(兄弟之邦及有利害關係國但不願參戰但不願參戰)積極介入」；
- 二、 第三層參與者談判廣泛的停戰條件；
- 三、 第三層參與者軟硬兼施，促第二層參與者接受這些條件，並施壓第一層參戰者接受；
- 四、 第二層參與者撤回對第一層參戰者的支持，事實上就是背叛他們；
- 五、 在這種壓力下，第一層參戰者願意接受條件。

杭廷頓進一步分析波士尼亞的和平進展，雖然涉及上述所有要件，但依然進展緩慢，由於斷層線戰爭由往上升高，而和平卻必須由上向下逐步解決，因此並非很容易成功。

第十二章 西方、多文明和單一文明

³⁸ 同注5，頁375~400。

³⁹ 同注5，頁405。

雖然杭廷頓在結論中提出：「在即將出現種族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人對西方文化遍及世界的信念有三大問題即這是錯誤的、不道德的和危險的」⁴⁰。

但他不僅提出「面對西方日漸式微的力量，保存西方文明符合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利益...」，更為未來世界規劃了維持和平的三項要件中「排除條款」、「共同停戰條款」，及共同尋求世界共通價值的「共通性條款」加重了西方勢力的影響。尤其是共同價值中法律和秩序皆是源自西方，所以似乎在杭廷頓的心中，世界文明可以多元，但維持似乎很依賴西方文明⁴¹。

肆： 分析與批評

杭廷頓寫這本書的中心思想，仍是在捍衛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所以一開始杭廷頓就將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作一分野，並敘述現代化的非西方仍不會是西方世界的朋友。

由於他恐懼西方的沒落和非西方世界的興起，因此他偏向注重文明間衝突面，並思索對抗的方法。尤其是他試圖喚起西方世界的重視，將儒回兩勢力的聯合以很大的篇幅來分析其對西方的威脅。

但如同東京大學教授伊東俊太郎所說的：「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文明，也不可能輕易產生任何聯繫...」⁴²，又如同葉啟政在中國時報上所分析的「杭廷頓患有偏執歐美中心主義思想，不符合時代潮流...」⁴³，更如同本文前言所述，杭廷頓只是在為西方尋找新的敵人，文明或許在未來的世界衝突中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絕對不是唯一的原因。

伍： 結論

⁴⁰ 同註5，頁432。

⁴¹ 同註5，頁434~435。

⁴² 「杭廷頓：中美可能爆發文明大戰」，聯合報，版九，1996. 9. 3。

⁴³ 葉啟政著，「對杭廷頓教授一文的一些聯想」，中國時報，版十一，1996. 11. 25。

誠如杭廷頓所觀察的「新多元文明時代」的來臨，而且文明秩序確實較能解釋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但衝突是否會由非西方文明所挑起？則大有問題。

第一：杭廷頓注意到西方文明對於非西方文明的壓迫，但卻沒有由此處下手解決，而多元文明平起平坐自然是解決衝突之道，但這似乎不符合西方的利益。

第二：杭廷頓忽略了歷史和情感是可以透過教育的手段加以弭平，雖然時間長，但總是一種方式。

第三：尋找共同價值，並非只有西方價值，而是需要更瞭解非西方社會，也許共同價值反而在此處。

第四：如大前研一在《民族國家的終結》一書中曾言，所謂文明的衝突大多是領導者為個人的政治目的或是私利而透過大眾媒體而加以刻意宣染的，一般大眾甚至於根本都沒有這種看法與想法⁴⁴。

第五：作者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即經濟對國際政治的重要性（不是作者所言的經濟是文化所控制與附屬品⁴⁵），在後冷戰時期經貿議題在國際政治的日程表上日漸重要，但作者似乎對此一現象做一扭曲的解釋（如作者於第五章的做法），而這並不符合國際政治的現實。

第六：就方法論的層面而言，作者主要是以文件分析來討論其所謂的「非西方文明」，但文件分析有一最重要的缺失，此即由於該方法主要是以分析當地的報導與文章以及一些有形的資料為主，常常忽略了許多無形的因素（或無法行諸文字的因素），如習慣或是社會學術語中的社會結構的影響⁴⁶，就如同作者所舉出的如李光耀或

44 大前研一著，李宛蓉譯，民族國家的終結（臺北：立緒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初版），頁14~20。

45 依Francis Fukuyama所言，新古典經濟學用來分析經濟現象有百分之八十正確，另外的百分之二十是其忽略了文化因素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見Francis Fukuyama 著，李宛蓉譯，誠信：社會的德性與繁榮的創造（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初版），頁17。

46 有一種方法可以彌補文件分析技術的缺陷，此即所謂的「俗民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其是由葛分柯（Harold Garfinkel）於1940年提出，有關其內容見吳瓊恩著，行政學的範圍與方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初版），頁269~279。

是馬哈迪，他們能真正的代表「東方精神（或文明）」嗎？筆者深感懷疑。

第七：文明的相互交流真的會帶來衝突嗎？法蘭西斯·福山於《誠信》一書中曾指出文明的相互交流並不一定帶來衝突，有時反而會使文明相互激盪，產生良性的後果⁴⁷。

第八：作者認為在未來的世界中回儒文明將會聯合起來共同對抗西方文明，但筆者以為此種的聯合只是短暫的，因為回教文明的排它性太強，以至於這樣的聯合只是利益的暫時結合而矣，依布里新斯基於《大棋盤》一書中曾言，除非中國大陸想要永遠貧窮與落後，否則，這種聯合發生的機率太低⁴⁸，因為中國大陸想要發展的資金與技術只有西方國家能夠提供。

最後世界的互動愈來愈頻繁，彼此因而了解也越來越深，共同利益的糾結，衝突只會對雙方都造成傷害，而尊重和理智的妥協才是解決爭端之鑰。

⁴⁷ 見Francis Fukuyama 著，李宛蓉譯，誠信：社會的德性與繁榮的創造（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初版），頁6~7。

⁴⁸ Zbigniew Brzezinski 著，林添貴譯，大棋盤（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4月，初版），頁243~245。

陸：參考書目

(壹)：書籍部份

1. Samuel P. Huntington 著，聶振雄等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台北：時報出版社，1994，初版。
2. Samuel P. Huntington 著，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4，初版。
3. K. J. Holsti 著，李偉成與譚朔成譯，國際政治分析架構，台北：幼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5月初版。
4. Thomas Khun 著，程樹德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4年初版。
5. Henry Kissinger 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上，台北：智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月，初版。
6. Samuel P. 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初版。
7. 大前研一著，李宛蓉譯，民族國家的終結，臺北：立緒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初版。
8. 葉自成著，俄羅斯政府與政治，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8月，初版。
9. 田弘茂等編，鞏固第三波民主，臺北：業強出版社，1997年10月，初版。
10. 田弘茂等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臺北：業強出版社，1997年10月，初版。
11. Samuel P. 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初版。

12. Zbigniew Brzezinski 著，林添貴譯，大棋盤，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4月，初版。

13. 吳瓊恩著，行政學的範圍與方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初版。

14. Francis Fukuyama 著，李宛蓉譯，誠信：社會的德性與繁榮的創造，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初版。

(貳)：報紙部份

1. 聯合報。

2. 中國時報。

3. 自由時報。